

論壇：學術「國際化」的得與失

### 三、來自美國的觀點—以政治學為考察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 美國社會科學學門中 台灣研究的縱覽

作者 鄭敦仁

美國威廉瑪莉學院政府系教授

美國亞洲評論主編

翻譯 陳鴻章

政治大學政研所碩士班

——次戰後的第一個三十年間，美國社會科學中，台灣研究是罕見的，隨後的二十年，台灣研究的興起，如流星般的迅速，且在新千禧年的拂曉已有良好的根基與普遍的認可。不論是國外或台灣學者的作品，今日的台灣研究，在研究主題及研究方法上和社會科學都有良好的連結。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對於台灣研究，在美國社會科學學門的定位，進行一些個人的初步觀察。這一個觀察主要集中在政治科學，並略為涉及社會學、發展研究及經濟學。在整個台灣研究發展的敘述上，是以年代為主配合呈現三個台灣研究的成長階段，以其研究題材的變化進行探討。當然某些論文將被引述為例證，但這並不代表我嘗試挑選出這個領域中的主要著作，因為不論是在台灣或國外，許多研究及著名的學者是被認可的，若要進行評述需要更大的篇幅。



#### (一) 隱匿的台灣： 在學界邊際的島國

二次戰後的二十至三十年間，在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SRC）的支持下，現代化理論家成為社會科學中的主流。隨前殖民地地區新興國家的迅速誕生，在政治自主及國家獨立後，現代化成為下一個被追尋的崇高目標。這個經驗世界的新事實，引起這一時期的學者開始尋求理論的普遍化，為了建立現代化過程的普遍原理，所以進行深入田野調查，來驗證理論。例如，亞洲已現代化成功的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日本、現代化中的泰國、非洲的迦納、中東的土耳其，皆同樣受到現代化學者的關注，但諷刺的是日本及泰國是非西方地區中，唯一逃過被殖民命運的國家。

雖然，共產中國不是被SSRC刻意挑選的對象，但卻為社會科學家普遍地投入時間及精力，進行研究的社會與政體。共產中國帶有劇烈社會劇變，及強烈意識形態進程的現代化路徑，和由上而下改革、實用主義的明治日本形成強烈的對比。明治維新與中國革命的比較，是一個普遍受歡迎的獵物，而印度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比較，同樣受到經濟學家喜愛。對前衛的社會學家而言，中國行為模式和西方行為模式，是一個鮮明且嶄新的對比，如 Franz Schurman 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的研究即是最好的例子。而在外交政策、國際安全次領域的學者方面，共產中國被視為是一個鐵幕後的封閉國家、冷戰時期西方的對手，及不結盟運動的推手，研究共產中國是知己知彼的必要課題。

在長期的現代化典範的陰影及中國研究的繁盛下，社會科學家對台灣研究幾乎沒有熱情。即使是在政策制定的觀點下，也幾乎沒有興趣與動機對台灣進行研究。終究，多數對台灣的理解，視台灣為一個受美援影響的美國附庸國家。

台灣並不是研究的主體，是一個中國研究中的枝節問題，或美國與亞洲關係中的一個問題。因此我們可以充分的了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二十至三十年間，絕大多數來自台灣在美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研究生，其學位論文是以中國大陸為主題，而不是以台灣為主題。且日後，是以其在中國方面的專業知識，活躍於美國各大學院校。

此一時期重要的台灣研究，主要是關於台灣如何運用國外援助、商業組織、政權型態等，但這些研究並沒有在學術世界引起重視。相關的研究例如 Neil Jacoby 慎重的檢視美國對台灣社會，在物質基礎援助的流動模式及影響，但其研究在發表之初，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Robert Silin 開創性的台灣商業組織研究，同樣是孤寂的，Gary Hamilton及其門徒在二十年後才投入這場論戰。而戴鴻超 (Hung-chao Tai) 則是從事土地改革政治、地方選舉與政治壓制間的緊張狀態研究。但在 Juan Linz 清楚的建構威權主義，且成功的挑戰極權與民主的二分政體分類之前，關於台灣政治統治的研究，並沒有真實理解台灣的政體。

在分裂國家典範上，台灣研究有稍微明顯的描繪。分裂國家研究，是一個冷戰的產物，其以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南、兩個中國間的互動，探討分裂國

家內的發展。即使分裂國家的研究未曾興盛亦未曾消失，然而其並未真實地成為一個主要的研究問題。且在任何的個案中，雖然沒有完全對稱的分裂國家，但台灣與中國大陸這一個案例，並未如東西德、南北韓一樣，能真實地相互匹敵，因此，兩個中國在分裂國家研究中，是最少被研究的。

## (二) 高能見度的台灣： 新興工業國家及不尋常的民主

經濟將台灣研究推向一個空前的高點，於一九八零年代，台灣不但有非凡的工業出口，同時有著低度的所得差異，在東亞以卓越新興工業國的姿態出現。此一時期，台灣研究以幾近兩位數的比率成長，而台灣的發展經驗，形成了一個新興工業國家研究上的新概念類別，尤其是對於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研究領域而言。同時，台灣研究自成一格並和中國大陸研究脫鉤，台灣政治經濟被有系統地和南韓進行比較，且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亦總是被引用來和拉丁美洲新興工業國家對照，其中又以台灣及南韓是兩個最常被引用的例子。但諷刺的是，當台灣研究開始飛躍的同時，卻因美國以台灣利益為代價，尋求和中國大陸聯合對抗蘇聯，而使台灣的國際地位降到最低點（參見James Mann與Robert Sutter的評析）。

那麼，什麼是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研究的知識脈絡呢？答案是依賴典範的式微。依賴理論觀點創始於拉丁美洲，並向非洲輸出，但卻因東亞的經驗證明其理論預測的錯誤而備受批評。即使如Peter Evans將原本的依賴理論修正為依賴發展，依然無法解釋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經驗的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發展較晚，但卻有持續的高度經濟成長、良好的所得分配、低通貨膨脹、較少的社會階級化、且台灣幾乎沒有外債。相對的，發展較早的拉丁美洲新興工業國家，呈現停滯並於一九八零年代陷入长期的外債危機。更為深刻的問題是，為何東亞新興工業國家是溫和的發展導向威權政體，但拉丁美洲新興工業國家，卻是有害的掠奪性威權政體呢？

Chalmers Johnson是解答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經驗之謎的領導者，其在通商產業省（MITI）與《日本奇蹟》一書的最後一章指出，台灣和韓國都是日本式的發展型國家，有別於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管理型國家及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型國家的國家菁英，不僅是進行單純的管理或以意識形態取代市場中的私部門，而且在威權主義的保護殼下，被賦予管理或取代市場中私部門的能力。Robert Wade以台灣為典型的案例來說明國家如何指導市場的運作。Stephan Haggard進行最廣泛的東亞與拉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丁美洲策略的比較。Peter Evans 則是說明威權主義的韓國及台灣，如何進行非洲的札伊爾及巴西都無法達成的公私部門連結與經濟轉換。Gary Gereffi & Don Wyman 編輯了 *Manufacturing Miracles* 一書，並譯成中文及韓文。在此著作中，台灣及韓國被系統化地比較，同時，高度經濟成長年度的政治變遷過程亦被對照。Gary Hamilton 等人提出了網絡資本主義體系，並對日本、韓國及台灣進行了徹底的研究。最後，當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對日本、韓國及台灣的制度及成長，進行一系列的研究時，世界銀行也開始找尋東亞成就的制度基礎及政策內容。

以上所提及的研究及其他相關的新興工業國家或台灣的研究，有三個明顯而值得一提的特色。首先，台灣幾乎在所有區域間、區域內的新興工業國家研究上，被當成追逐的典型。所以，在絕大多數研究讚許台灣發展過程的情況下，台灣已不需要自我推銷。其次，這些研究採用歷史制度論途徑及路徑依賴分析，企圖解開政府如何有效引導市場，及制定良好政策的制度基礎。以這些新的研究途徑，研究政治經濟和第三世界發展，主要是回溯制度架構的起源與發展。最後，有關新興工業國家的主要研究，皆是由政治經濟學及社會學的學者所進行的。同時，台灣是一個首要被解

答的謎，亦是一個主要學者不可能放棄的理論發展案例。

於一九八零年代後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衝擊亞洲地區，並為台灣研究進一步注入原動力。第三波民主轉型起始於一九七零年代的南歐地區，並於一九八零年代初擴散至拉丁美洲，於一九八零年代晚期衝擊東歐，同時造成全面性大規模的民主轉型。然而亞洲地區並非如此，亞洲民主運動有成有敗，目前該地區民主與非民主國家的數目是相當的。因此，研究民主轉型的學者，被亞洲地區成敗交錯多樣的民主運動結果所吸引。在這個新的研究領域中，台灣再一次成為最顯著的案例。台灣不僅是新興民主化亞洲的一部分，同時其民主化過程也相當不尋常。其威權時代的執政黨在緩進的民主化過程中未曾失權，政治韌性與墨西哥的制度革命黨相當，已略具長期主導民主過程的實力，頗具以色列勞工黨、日本自民黨、瑞典社民黨及義大利基民黨的威勢。研究民主轉型的學者，迅速關注到台灣民主轉型中，許多非常態的情況，例如，低社會成本的民主轉型，及轉型過程中持續存在的國家認同問題。

由於台灣研究獨創性的崛起，使得來美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台灣學生，全力投入台灣政治經濟的發展與民主的變

遷的研究，或將台灣含括在其比較研究中，而只有少數學生研究中國大陸。此外，這時期的莘莘學子將台灣置於理論的或比較的觀點，此不僅具有學術的意義，同時亦是生涯的希望。純粹的台灣專家幾乎沒有機會通過任期檢驗，必須是一個以台灣為案例為研究對象而專攻民主轉型的學者、政治經濟學者或是方法論學者，才能在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開拓學術生涯。

### （三）台灣研究日漸成熟

台灣研究在經歷了二十年的擴充後，似乎失去了些許的朝氣，且在世紀交替的時刻，再一次和中國研究連結。當台灣令人驚奇的發展與民主轉型之謎，逐漸獲得解答後，台灣已不再是一個迷人的研究主題。當台灣的新興民主被鞏固，對台灣民主的研究轉向選舉的過程的研究。Peter Odegard 在一九九八年美國政治學年會台灣研究小組會議中，對台灣研究所提出的評註是深具啟發性的。他指出：在台灣，選舉行為已是正常民主過程的一部分，且我們可以在其他如美國這樣的穩固民主國家發現相同的結果時，台灣的選舉行為研究已無法如以往那樣讓他興奮。

此外，有強烈吸引力的中國研究領域，開始衝擊台灣研究的學術社群。過

去二十年間，中國大陸在缺乏重大政治制度轉變的情況下，創造了驚人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已成為一個吸引優秀學者投入的新課題。更甚者，越來越多對於中國大陸的研究計畫被執行，而台灣研究似乎被整合入中國研究的一部份。例如，對於台灣選舉過程的研究，並非完全是為了台灣本身，而是為了更了解兩岸關係的變遷過程，或者是否為中國大陸可能變遷的原因之一。諷刺的是，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但卻由於中國的導彈威脅，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與聲譽。此時台灣研究的發展，卻出現一種減緩的情況，甚至於有蕭條的跡象。

台灣研究如果呈現蕭條，那可能只是表象。雖然台灣研究的熱情有些許降溫，但其興趣仍然是持續的。雖然台灣研究與中國大陸研究有更頻繁的連結，但是雙方擁有各自的學術社群及相當的相互自主性，兩個學術社群間的互動，應可維持互惠、對等的原則。本質上，台灣研究歷經二十多年來的發展，其主力已相當多樣化，且研究方法亦更為純熟。從事台灣研究的學者，至少在四個研究舞台上，不但可以平穩的縱身躍入下一回合的知識研究，甚至可以在跨國研究計劃上，取得領導的地位。

首先，在東亞發展研究上，雖然有關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著作已頗浩瀚，但是學界對於東亞模型的解構、超越狹隘工業政策的界限、對亞洲發展模型更為持平的評估，還存有有著相當強烈的需求。在這些新的學術努力上，台灣再一次具有重要地位。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模式並不一致，至少台灣及南韓是兩個已經被確認的次模型，政治經濟學者期待，對台灣及南韓這兩個或其餘的次模型，進行更為精細的描述。例如，在這個次模型下，政策誘因是如何設計的，工業結構如何形成，各界利益如何調和，政策如何管理，全球化挑戰如何克服。此外，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發展的次模式在不同地區，如何受到不同型態國家的重視。是否泰國、墨西哥、肯亞偏好台灣模式，而馬來西亞、巴西、象牙海岸走南韓模式。

政治經濟學者們同時也已經超越以往的關懷，不僅在工業政策是否有益或傷害發展上進行爭論，而且在民主化與全球化的脈絡下，檢視環境管制、社會福利供給、教育及預算制定等政策領域。目前該問的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是否跳脫過度發展的北歐社會福利國家陷阱，以不同的方式，設計多樣的代間社會契約呢？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是否有較好的社會微觀基礎，可供緩和鄰避症候群症（the NIMBY syndrome）（編者按：NIMBY, Not In My Back Yard, 「不要在我家後院」。例

如個人或社區反對在自家附近興建某種設施或土地利用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以及支持永續發展？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是否具有良好的宏觀（憲政設計）及微觀（預算條例）的制度，來排除或降低感染民主通病（預算赤字）的機率呢？對於以上提到的問題，台灣可能是典型研究案例，在理論上具有相當的開創力。台灣自然環境的破壞相當徹底，但環保意識格外高漲，防護性的金融保守主義根深柢固，對於福利國（welfare state）的需求極為強勁，可是福利社會（welfare society）的傳統仍然可見。如果台灣無法因應這些新政策所帶來的挑戰，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亦不可能因應的。如果在台灣脈絡下發展的理論命題得不到支持，在其他較輕微的國家案例上也就不能適用了。

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啟發下，政治經濟學者們也殷切的期待，能對於多樣的東亞模式，有一個更持平、確實、穩固的評估。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東亞模式是被稱頌的，尤其是南韓被視為是一個高效能的網絡資本主義典型。但在亞洲金融風暴開始之後，即使某些學者與政治領袖不屈不撓地為東亞模式辯護，但是大多學界與政策界人士毫不留情的，急聲宣告東亞模式的失敗與死亡。然而，當亞洲金融風暴出人意外地迅速結束，那些東亞模式的批判者，如同最初發動批判般迅速地沉寂下來。而台灣在

這場金融風暴中，並沒有遭受嚴重的衝擊，台灣是東亞模式中，明顯不同的案例（中國大陸雖然安然無恙，但大多數專家以為大陸金融體系極其封閉，因而仍未受嚴峻挑戰。）所以，台灣或許是一個可以對東亞模式，進行較為一致且持平評估的實驗室。

其次，台灣研究學者的第二個研究舞台，是新興民主化亞洲的制度與治理方式的研究。有關民主的亞洲的研究，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不再如以往關注民主化的起源及過程，而是關注民主轉變的結果。這方面的研究，從事台灣研究的學者，不僅持續的活躍；同時，也是這個研究領域中的研究議題的主導者。由國科會出資，國立政治大學和國立台灣大學等，週期性執行的選舉調查，和中研院所進行的社會意向調查，是廣為人知的。這些調查資料開放的速度與條件長久以來曾備受爭議（社會意向調查資料釋出一向較快），但是其品質是知名的。在海外，台灣總是被包括在主要的調查，和廣泛被使用的跨國資料庫中。例如，密西根大學的世界價值計劃、密西根大學的地方政治菁英計劃、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為主的官僚政治計劃、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為主的選舉體系與選舉計劃，及麻省理工學院為主的政治穩定調查。附帶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台灣被學術聲望極高的跨國

研究計劃所包括，但卻被排除於主要的國際組織之外，這樣的情況確實是相當可悲的。

近年來台灣研究的學者，至少已經在五個跨國研究計劃中，取得領導地位。例如，亞洲選舉體系與選舉的比較研究、經歷霸權政黨統治國家的政黨體系變遷比較研究、亞洲民主價值的跨國調查、四個亞洲新興民主國家（韓台菲泰）的制度設計與民主治理的比較研究。而且，台灣個案研究，例如半總統制體系下的政治結盟、多席次單記非讓度選制下的立法行為、少數族群的策略性投票等，對於比較政治研究文獻也有重要的貢獻。關於探討政黨結盟形成邏輯的早期文獻，是在內閣制體系下進行的。而策略性投票的文獻，則未曾詳論族群因數在選舉選擇上所造成的影響。這些現實性問題的研究，確實將台灣標示在理論性文獻的版圖上。

台灣研究極具潛力的第三平台是，比較勢力不對稱的雙邊關係（asymmetric dyads），這一個未全然被探索的領域上，可能有亮麗的未來。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所存在的持續政治緊張，和日漸加深的經濟互賴，可說創造了一個迅速成長的兩岸關係動態研究。明顯的，海峽兩岸間的雙邊關係，是一個勢力不對稱的國家關係，台灣在人口、土地、

軍隊及經濟上的規模皆是較小的國家，但卻有民主體制及開放的社會；而中國大陸是極為巨大的，且是一個有牢固控制體制的國家。在勢力不對稱的情況下，雙方互動的影響與模式，已成為處於弱勢一方學者的困擾。加拿大及芬蘭的學者，為建構其與美國及前蘇聯的個別聯繫，已經投入數十年的時間，檢視各式各樣的途徑。在這個研究舞台上，兩岸關係和其他勢力不對稱國家（如芬蘭-蘇聯、加拿大-美國、以色列-阿拉伯國家、斯里蘭卡-印度、科威特-伊拉克、現代化以前的日本-王朝時期的中國）的比較，將產生理論性的洞察，且把台灣研究置於另一個分析的面向上。同時，以這一個廣泛比較觀點所作的研究，自有其政策意義。

最後，台灣研究的學者正進入認同政治這個研究領域，在台灣選民的認同分歧、認同變遷方面，已經進行為數眾多的調查，並被分析與理論化。國家認同常常是被塑造的，而非與生俱來的，且不是一種固有狀態，而是一個過程。如同選舉研究一樣，國家認同的研究必須在時間上是連續的。在國家認同研究上，研究者總是能夠期望，以新的調查方法，來發現及解釋。而且，有關台灣的國家認同的研究，可以和美國的政治科學及社會學，找到認同政治文獻的新對話方向。部分新的政治認同文獻，是

被鑲嵌在全球化的論述上。部分新的認同政治文獻，是奠基於一系列對於在九〇年代，自蘇聯帝國獨立的新國家，所進行的一系列跨國研究。這個研究領域中，是由史丹佛大學的 David Laitin 所開拓的。Laitin 和其他參與這個計劃的學者，探究許多和台灣研究相似的問題：蘇聯（或任何帝國）崩解後的新興國家中（successor states），何以有某些團體偏好完全的獨立、某些偏好建立自治區、某些則渴望再次的國家整合？跨時間及跨團體的國家認同的變化，能說明分歧的政治偏好嗎？Laitin 等人已探索若干可能影響這些偏向的解釋，包括理性選擇、經歷高壓統治的倖存、感情等因素。然而，從事台灣認同政治研究的學者，如何和 Laitin 等人進行對話，將是令人期待的。

透過台灣研究在美國社會科學學門發展情況的描述，並進行未來發展願景的勾勒，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研究不但絕對沒有滅絕的危機，而且可說已近乎融入主流社會科學。台灣研究和社會科學學門間的關係，已具有良好的根基。台灣不但是具有激發作用的理論案例，而且是一個良好的測試案例。台灣研究在理論探討、題材篩選與界定、概念架構及研究方法上已臻高度成熟。台灣研究文獻中，博弈理論、交易成本分析，甚至是代理人模型等，已漸獲運用。同

時，台灣研究的檔案紀錄數量，是極令人滿意的。在美國政治學會中台灣研究會議團體（Conference Group Of Taiwan Studies，CGOTS），每年都分到三個場次，這是超過韓國會議組所能獲得的會議數目。而在以往的十五年間，《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這一個國際頂尖學術期刊，共出版了四篇關於台灣發展及政治的論文，且另外有兩篇是高度集中討論台灣及韓國的論文。這份成績單遠超過韓國，而與共產中國的研究打成平手。「世界政治」每期只刊登五篇論文，而世界上共有192個國家，但在此一期刊上，關於台灣的論文數目和中國研究竟是難分高下，誠屬不易。我們可以預期台灣研究將持續地繁盛。

